

王东明忆父亲王国维之死

王国维，中国近现代著名学者。1927年6月2日，王国维在北京颐和园昆明湖鱼藻轩自沉。王东明为王国维长女，她从女儿的视角，叙述了父亲的生前身后事。

投湖之前的日子

父亲为什么要跳湖自杀呢？关于这件遗憾事，讨论的人很多，提出的原因也各有不同的见解，包括逼债说、殉情说、时局逼迫说等。我回想起来，可能是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造成的，导火线是大哥潜明突然病逝，大嫂罗孝纯是罗振玉先生（中国近代语言文字学家，王国维之友）的女儿，被罗振玉带回去照顾，父亲受到很大的刺激。

1918年，大哥19岁在上海结婚，大嫂即罗振玉之次女。父亲与罗振玉先生初为师生，继为朋友，终为儿女亲家，关系实不同寻常。然而好景不长，1926年9月，潜明哥在上海突染伤寒症去世。父亲为他主持丧事。罗振玉也到上海慰问，并安抚自己的女儿。丧事办完，罗振玉就带着女儿回到天津罗家去了，当时称之为“大归”。

父亲个性刚直，他最爱大哥，大哥病逝，给父亲很深的打击，本已是郁郁寡欢，而罗振玉又不声不响地偷偷把大嫂带回娘家。父亲怒道：“难道我连媳妇都养不起？”然后把大哥的抚恤金及他生病时大嫂变卖首饰的钱全汇去罗家。他们寄还回来，父亲又寄去。如此往复两回，父亲气得不言语，他从书房抱出了一叠信件，撕了再点火焚烧。我走近去看，是罗振玉写给父亲的信。此事后，不再见父亲的欢颜，不及一年

他就投湖自尽。

投湖当天

1927年6月1日，离端午节还有一天，清华国学研究院的人谁也不想不起过节，都在忙毕业生的毕业事宜。

学生们忙着向老师告别，请老师题字，父亲也为学生题扇。中午，举行导师与毕业生的叙别会。席仅四桌，席间父亲那桌寂然无声，因他惯常寡言笑，大家也习惯了。后来有位山西籍的学生听传闻北伐军将至，怕时局会乱，敦请父亲去他家乡山西长治，父亲答道：“没有书，怎么办？”接着梁启超起立致辞，表扬同学成绩优秀，对清华研究院满怀希望：“继续努力，清华必成国学重镇。”父亲点头赞同。

下午和晚上，有多名同学拜访父亲。父亲送走学生后，回屋继续评阅学生试卷，回忆中，父亲当夜熟眠如故，并无异样。

1927年6月2日，早上一切如常，父亲早餐后独自出门。到了研究院教室之后，又与同事商议下学期招生事，并嘱咐办事员到家里将学生成绩稿本取来。

一切料理妥当之后，他向研究院办公处秘书侯厚培借2元钱。侯厚培身边无零钱，就借给他一张5元的纸币。当时教授习惯身边并不带钱，侯也不以为意。两人谈话甚久，父亲走出办公室，就去清华南院校外两旁守候的人力车中，雇车赴颐和园。进园前，命车夫等候，并付洋5毫。

父亲10点多钟走入颐和园，漫步过长廊，在石舫前兀坐沉思，不多久即步入鱼藻轩，吸纸烟。大约11时左右，

从鱼藻轩石阶上跃身入水。有清洁工闻声即来救助，捞起后，已气绝。当时投水最多两分钟，看来父亲死志已决，用头埋入淤泥中，窒息而死，因为那里的水浅，死前背上衣服还未湿。

其时，母亲久等父亲不归正感奇怪，三哥贞明刚从上海转到燕京大学准备就读。中午回家吃饭，他到清华找父亲，在校门口问车夫，才知父亲出了事。

到了下午7时许，清华学校全校之人均知此事矣。晚9时，教职员、研究院学生20余人，乘两辆汽车至颐和园。园门已关，守兵不许进入。经再三交涉，始准校长曹元祥、教务长梅贻琦及守卫处乌处长入视。

6月3日晨，母亲带着我们及教职员、学生等人园探视。时父亲遗体仍置于鱼藻轩亭中地上，覆以一破污之芦席，家人及学生莫不痛哭失声。

下午4时，检察官始至验尸，此时在父亲口袋中，搜出遗嘱一封，并现洋4元4角。

是日，送殡者有清华教授梅贻琦、吴宓、陈寅恪、梁漱溟、陈达；北京大学马衡教授，燕京大学容庚教授，研究院学生均前往送灵。

父亲死后，法医在父亲口袋中找到遗书一封，纸已湿透，然字迹清晰，封面写着“送西院十八号王贞明先生收”，因为当时大哥已逝，二哥又在外地工作，所以写了三哥的名字。遗书内中云：

五十之年，只欠一死，经此世变，义无再辱。我死后，当草棺殓，即行稿葬（草席裹尸随便埋葬）于清华莹地。汝等不能南归，亦可暂于城内居住，汝兄亦不必奔丧，固道路不通，又不增出

门故也。书籍可托陈、吴二先生处理。家人自有人料理，必不至不能南归。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，然苟能谨慎勤俭，亦不至饿死也。

五月初二日 父字

父亲的后事

这份遗书是父亲自沉的前晚写的。据母亲说，他当晚熟睡如常，并无异样，可见他十分镇静，死志早决。

依了父亲的意思，我们不曾请风水师择坟，也没挑选“吉日”，就在清华外面七间房买一块地把父亲葬了。坟是清华的泥水匠做的，立了个碑，上书宣统皇帝封的谥号“王忠愍公”，坟地四面都种了树。“王忠愍公”是有一段来历的。父亲去世之后，罗振玉先生送了一份密封的所谓父亲的“遗折”给皇帝，充满孤臣孽子情调的临终忠谏文字。宣统皇帝读了大受感动，和师傅们商量后，发一道“上谕”为父亲加谥“忠愍”，派贝子溥忻前往祭奠，赏陀罗经被并大洋千元。

其实，遗折是罗先生命他的第四个儿子仿父亲的字迹写成的。罗先生为什么这样做？想是要利用父亲“忠于清室”来标榜自己吧！

这些年来，凡是有关父亲的任何资料我都尽量加以剪存并仔细阅读。时间越是长远，越深刻地体会到自己对父亲的感情与愧疚，正如父亲的词句：“已恨年华留不住，争知恨里年华去。”

三哥也说，想到父亲生前“人生飘忽，悲欢无据之意境，亦即无可免之悲剧……”中的情境，总会怅然而泪下。

据《我和我的父亲王国维》王东明/著

革命战争时期的疫情防控

在川陕革命根据地，1934年，伤寒、痢疾和疟疾在整个苏区流行，严重威胁着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。1944年，陕甘宁边区政府驻地延安出现传染病疫情。解放战争时期，瘟疫仍然是根据地军民的健康杀手。

为保障人民群众的健康和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，毛泽东等中共领导极为重视卫生防疫工作。1929年，毛泽东提出“一切为了人民健康”的卫生工作宗旨，指出医疗卫生工作要面向大多数人，为大多数人服务。在毛泽东的领导下，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举措，普遍开展了群众性的卫生防疫运动。1932年初，赣西南的富田发生鼠疫，闽西地区又天花横行。为遏制病情传播并迅速消灭疫情，毛泽东于1月12日主持召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会议，紧急讨论防疫问题。决议指出，“为保障工农群众的健康和预防瘟疫发生起见，决定举行全苏区防疫卫生运动”。1934年3月10日，中央防疫委员会成立。苏区的卫生防疫运动也推广到全国其他地区。通过“天天做，月月做，年年做，家家做，村村做，乡乡做，个个圩场个个城市做”，防疫运动取得显著成效。

解放战争时期，解放区军民建立了各级卫生防疫站和卫生技术厂，加强预防接种，对疫区染疫人员进行及时、有效的隔离，还建立疫情报告制度等。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规定，当发现鼠疫或疑似患者时，其家属或邻居必须上报

患者情况，逐级经过卫生组长、屯卫生员上报街或村卫生委员，这一过程要在3小时内完成，48小时之内要向所在省的卫生厅上报情况。为了发动群众积极参加卫生防疫运动，革命根据地的党政机关借助各种媒介，采取各种办法，开展了广泛的宣传工作。

1933年2月13日，《红色中华》发表题为《加紧防疫卫生运动》的社论。1938年4月30日，《新中华报》推出“防疫”专栏，提出“经常保持室内外清洁，防止苍蝇发生传播病毒”等八条具体的防疫措施。此后，《新中华报》《解放日报》多次刊发“把卫生运动广泛的开展起来”“重视防疫”“夏季防疫工作”等社论、时评及其他预防疾病知识的科普文章。据不完全统计，自1941年11月24日《解放日报》开辟“卫生专栏”起，先后刊出医药卫生方面的文章200余篇。

在经济文化落后的革命根据地，利用图画宣传疫情防控知识，既直观清晰、形象生动，又容易让老百姓接受和理解，效果更为明显。上世纪三十年代初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开展卫生防疫运动时，要求各部队、各地区深入开展卫生宣传工作，鼓励大家编写卫生墙报或画报，优良者予以奖励。抗战时期，各根据地卫生防疫宣传，采用宣传画的形式逐渐增多。其中，陕甘宁边区举办的医疗卫生展览会，实物、文字、图片、连环画相结合的方式，深受老百姓喜爱。 吴继金 贾向红/文

